

古代晋中名人篇赏析

(七)

宋辽金元(下)

□赵世芳

(上接第08/09版)元好问曾受其教诲,对杨云翼的德业、学识与政功给予至高评价:“若夫才量之充实,道念之醇正,政术之简裁,言论之详尽,粹之以天人之学,富之以师表之业,则我内相文献杨公其人矣。……惟其视千古而不愧,是以首一代而绝出。”此言精准概括杨云翼的一生:才识器度弘厚渊深,儒道心性纯粹端正,理政简明果断、议论周详缜密;又精研天人义理、律历象数之学,长期执掌文衡、教化士子,堪称一代师表。元好问并未单纯称颂其文辞,而是以德行、实学、治政、教化四维为其定位,将他誉为“为国著龟,为民表仪”,即国家决断国事的智囊准绳、世人立身行道的道德楷模,树立起金末乱世中纯正儒臣的理想人格范式。

贞祐南渡(1214年)后,金朝丧失华北故土,局促河南一隅,国势衰微,朝堂阿谀成风、士风萎靡。杨云翼与赵秉文并肩共治文柄、交替主持科举,数十年间提携后进、整饬文风士风,《金史》誉二人为“金士巨擘”。二人接续金代“国朝文派”文脉,矫正金末浮华空疏的创作弊病,上承宋儒义理、下开元初北方文风,构筑起宋、金、元北方文学传承的关键纽带,元好问便是其门下最杰出的

后学代表。

文学思想层面,杨云翼提出明确的文道合一主张:“学以儒为正,不纯乎儒非学也;文以理为主,不根于理非文也。”他明确治学当宗儒守正,无儒学根本则无真学问;为文当植根义理、贴合世用,无义理支撑则无真文章,以此矫正当时重辞藻、轻义理、尚虚华、弃实务的文坛积弊。

政见与治道层面,杨云翼与赵秉文同声相契、同心辅政,共同编纂《君臣政要》《龟鉴万年录》,以历代治乱兴衰劝谏君主、匡扶朝政。金宣宗末年,朝堂盛行“取偿于宋”的片面用兵论调,朝臣多畏祸缄口、曲意逢迎,唯有杨云翼挺身而出,上《谏伐宋疏》力阻南伐。其疏言:“国家之虑,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,而在既得淮南之后。盖淮南平,则江之北尽为战地,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,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。”又直言时弊:“不能外御北兵,而取偿于宋。两淮生灵,皆陛下赤子。”

他深刻预判金朝骑兵优势利于平原陆战,若深入江淮水网地带,战马劲弓无从施展,即便侥幸占据淮南,也会陷入无休止的边防拉锯与后勤困境,后患无穷。同时,他秉持儒家民本思想,批判朝廷无力抵御蒙古强敌,却转嫁兵祸、掠夺邻邦,视两淮苍生为博弈筹

码的短视国策。最终,金军执意南伐、兵败淮上,主力全军覆没,国力进一步耗竭。宣宗事后追悔莫及,痛责诸将:“我当何面目见杨云翼耶!”此语既印证了杨云翼超凡的战略远见,也凸显其在金末朝堂之中独一无二的忠直风骨与社稷担当。

附:

元好问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·铭文

天禀之厚百可施,
曾门之传俨若思。
菁莪乐育并以资,
大器备具无磷缁。
山甫吉甫其庶而,
鲁无君子焉取斯。
贞祐南驾倾朝支,
忿兵横出纷僵尸。
丁男役苦输膏脂,
公独上前陈苦辞。
同仁一视父母慈,
越肥秦瘠小智私。
两淮民命我所司,
忍令矛端舞婴儿。
昆仑神泉后术芝,
危国可活民不疵。
如公岂无匡复姿,
天废商久实为之。
孺子可教犹帝师,
惜哉不遭隆准时。
东隅之日今崦嵫,
顾瞻乔木为贵咨。
岘山堕泪方在兹,
零落何必西州诗。

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收录于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十八。杨云翼曾任金代翰林学士,哀宗朝担任益政院说书官,于内廷为皇帝讲论经史、参议军国大事。益政院有“名为经筵,实内相也”

之说,元好问遂以“内相”作为其雅称;杨云翼去世之后,朝廷赐谥号“文献”,碑题因此题为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。

碑文由散文序传与篇末七言总铭两部分构成。末尾的总铭以七言韵文写成,称颂杨云翼天资禀赋、家学滋养与坚贞品格;借典故寄意,表彰贞祐南渡国难之际他谏阻南伐、体恤两淮苍生的立场;又感慨其生值衰乱之世,怀抱匡时济世之才却不得施展,痛惜贤才早逝,预言其德行将长久为后世追念。需要说明的是,总铭篇幅有限,并不铺陈完整事件,多依靠典故完成叙事与评判。

这篇铭文的艺术特色是,其一,以儒家经典为主,大量化用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的文辞意蕴,兼采前代贤臣故事。元好问并不直接铺叙史实,而是依托典故承载丰富内涵,在简短的七言体制中拓展文本容量。其二,典故存在双重指向,如磷缁、菁莪、仲山甫、尹吉甫一类典故,用以褒扬人物德行才学;忿兵、天废商、东隅崦嵫、岘山、西州等典故,则指向时代沉沦的历史悲剧。其三,将价值评判隐寓于典故之中。铭文不直接指斥金宣宗,而是借用“忿兵”“肥越瘠秦”的典故内涵,委婉批判“取偿于宋”的南伐国策;也不做直白溢美,而是借西周中兴贤臣的典故抬高杨云翼的儒臣地位。其四,以古喻今,将金末乱世之中杨云翼的出处与作为,放置到历代贤臣的历史谱系之中,完成对传主的历史定位。